華人應用人類學學刊
Chinese Journal of Applied Anthropology
發行者:華人應用人類學會 臺灣

華人應用人類學學刊・第 1 卷 第 1 期・2012 年 6 月・頁 117-135

應用人類學的倫理挑戰：美國經驗的啟發

劉紹華 *

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副研究員，臺北

林文玲

國立交通大學人文社會學系副教授，新竹

摘要

本文回顧應用人類學在美國的發展歷程，從研究主題、研究經費來源與研究目的等面向，指出應用人類學的特質使得其在整體人類學倫理的議題上，既是最重要的建置者，也是最關鍵的被檢視者。以應用視覺人類學為例，本文討論潛在的倫理爭議，以說明當代應用人類學者在關注或介入社會現象時，可能面臨的跨領域與多元方法的複雜倫理挑戰。不同華人地區人類學的發展有其殊異的政治與社會情境，而透過檢視美國人類學的倫理爭議歷史與焦點，有助於吾人思考華人地區應用人類學的發展。

關鍵詞：人類學倫理，應用視覺人類學，介入，倫理爭議

收稿日期：2012.03.12，修稿日期：2012.04.13，接受日期：2012.04.16
* E-mail: shaohua@gate.sinica.edu.tw

一、前言

應用人類學的發展與人類學倫理論辯的歷史始終並駕齊驅。應用人類學的三個主要特質是其價值與爭議來源，包括：研究主題、研究經費來源、以及研究目的。從主題觀之，應用人類學明顯的跨界性質，加上以推動社會變遷為其核心關懷，這和一般著重抽象理論、或無涉人群或社會福祉為主題的研究相比起來，容易觸及學術研究與政治的敏感神經。就經費來源而論，應用人類學者，尤其是涉及學院外應用研究的人類學者，包括受雇於學院外的全職工作者，以及接受非學院機構的委託研究計畫者，由於研究目的可能受到委託者的影響，以致被其他人類學者質疑可能在學術的中立客觀性、維護被研究者的利益等方面，出現妥協的情況。

此外，許多學者以為，應用人類學作為一個人類學分支學門，其最主要的存在價值是「介入」（intervention）（Singer 1994）。通常應用人類學的研究目的若非介入活動本身，便是得以對未來的介入活動提供反省與實作建議。關於介入議題的探討在此一分支學門中便相形重要。然而，介入所引發的爭議，一向是講究全貌式民族誌研究方法的人類學者的倫理討論困境（Hastrup and Elsass 1990）。其主要理由是因介入時必須「選邊站」，這可能與民族誌重視理解田野中不同利益面向的思考有所歧異。不過，這種基於抽象方法論的思考而質疑「介入」的正當性論調，卻也受到不少學者的批評，認為如此反而落入「道德相對論」的困境，讓人類學者在田野中欠缺道德與倫理責任。這樣的困境尤其直接衝擊以弱勢群體的福祉為主題或田野情境的第一線研究者（Liu 2010）。

簡言之，應用人類學的特質使得其在整體人類學倫理的議題上，既是最重要的建置者，也是最關鍵的被檢視者。Theodore Downing 的案例可以突顯這些特質易於產生的倫理困境。1998 年時，世界銀行（World Bank）擬於智利彪彪河（Bío-Bío River）上建造水壩，委託長年合作的人類學者 Downing 進行社會衝擊評估調查。通常，委託計畫的雇主要求研究資料的所有權歸屬於雇主，研究者不得自行公布或流通研究成果。然而，Downing 調查後發現，興建水壩將會嚴重影響當地原住民的福祉。他認為人類學的基本倫理是不得進行秘密研究，因而主動告知當地原住民調查結果。世界銀行據此欲對 Downing 提出訴訟，美國人類學會（American Anthropological Association, AAA）則站出來要求世界銀行向 Downing 道歉。值得一提的是，Downing 與當地原住民分享其研究成果的動機與作法，是基於他對人權與倫理的立場所致，實則已超越美國人類學會對於「介入」行動的要求（Fluehr-Lobban 2003:21–23）。

Downing 的案例指出了最為困擾應用人類學者的倫理處境。由於研究主題經常事關重大，且研究經費來源無法保障獨立研究，研究者易夾處於對研究對象的倫理義務與對雇主的法律責任之間。法律與倫理不見得始終並肩作戰，甚至與政治正確的社會論述亦可能立場不同。此外，是否起而行動採取有利於研究對象的介入措施，也常超越象牙塔的思考範疇，涉及社會正義的掙扎。

不過，介入也並非毫無社會正義之疑慮。由於田野中不同力量的競合，人類學者的「介入」可能造成的正負影響亦是重要的倫理考量。應用人類學者在田野中的介入角色類似於文化中介者。其動機可能出於良善，但結果卻可能出現爭議。人類學者 Jayasinhji Jhala（2009）的經驗可為一例。2001 年 1 月 26 日印度西部發生芮氏 7.9 級的強烈地震後，Jhala 進駐受災情形最為嚴重的幾個村落，展開一項減緩災難危機的應用視覺人類學計畫。Jhala 探討不同層級的組織，包括印度中央政府、省級單位及村落、國際救援組織、電視臺、以及宗教慈善機構，甚至納入種姓制度的因素等，如何依照各自的功能屬性，推動及影響災後重建工作。這些組織同時進入災區工作，其目標與分工皆有所不同，在互動中也產生出相互競逐的關係。Jhala 的影像計畫讓災民透過講述故事抒發心情，鏡頭也帶著他們（Jhala 做訪談，他的女兒擔任攝影師）沿著毀壞的屋舍繞行，仔細指出損害的狀況與嚴重性。Jhala 的計畫並非受託於印度政府。他的美國學者身分使得他比當地學者有更多的自主性，且擁有相當資源可以拍攝、累積大量的影像敘事與故事。如此檢視災情的模式有別於印度政府「快照模式建立補助證據」的運作方式。簡言之，Jhala 擁有充分的知識與援與先進設備，得以推動具備倫理反思的影像應用實驗。在減緩災民的痛苦與絕望等方面，提供了一種另類但務實的「災難救助」模式。然而，此類計畫仍隱含著倫理爭議。由於影像的介入，被拍攝者再次經歷受災的「苦痛」。我們可以反省的是，災民是否一定要透過這種方式才能獲得情緒紓解？或者，這樣的過程真能有助於災民紓解痛苦嗎？此外，雖然 Jhala 的計畫志不在拍成民族誌影片以參加影展或學術研討會，但應用視覺影像計畫累積了大量的「經驗」及「資源」，其中隱含的再分配或社會影響等議題，也有許多值得討論的空間。

本文的討論先以美國人類學為主要例子，簡述應用人類學的發展及其倫理議題。此外，應用人類學的特質隱含的倫理挑戰主要表現在研究者、研究對象與研究贊助者三者間的複雜關係，其中研究對象的福祉是所有人類學倫理討論的核心。本文便以近年來蓬勃發展的視覺人類學做為應用人類學的一個分支案例，呈現其在研究倫理上的價值貢獻與潛在爭議。

二、美國應用人類學發展回顧

英美人類學的肇始與其應用性密切關聯。在美國，應用人類學的發展可追溯至人類學在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的作為。這有兩個層次的意義。其一，兩次大戰之間的美國人類學對於戰爭本身以及對於參與情報蒐集的反省；其二，人類學展現出的應用性，主要表現在與國家有關的面向上，例如，原住民的治理及社會不平等。雖然應用人類學在二戰左右才正式成立分支學會，但其早年的歷史對於我們理解它的當代面貌仍有其意義。

學者將應用人類學的發展分為五個階段：（一）前學科時期（predisciplinary stage）（pre-1860）；（二）應用民族學時期（the applied ethnology stage）（1860-1930）；（三）聯邦工作時期（federal service stage）（1930-1945）；（四）擴張時期（1945-1970）；（五）政策研究時期（1970- 至今）（McDonald 2002:2; van Willigen 1993）。

第一個「前學科時期」涉及人類學與殖民主義「共謀」的歷史。英國及其他歐洲殖民國訓練官員到遙遠的非西方殖民地開展治理。在美國，人類學者不需要離開本土，主要的研究與美洲印地安人的遷移與保留地有關。此一時期的人類學幾乎可以和應用人類學畫上等號。權力不平等與殖民剝削的時代背景，是後世對於人類學與殖民主義歷史糾葛嚴加批判之主因。

第二個「應用民族學時期」以美國為主，我們看到大量關於搶救美洲印地安文化的研究出現，甚至形成「印地安學」（Indianology）。美國國會於 1824 年成立了印地安事務局（Bureau of Indian Affairs），又於 1879 年成立美國民族學局（Bureau of American Ethnology）。兩個組織的原住民工作可謂今日美國應用人類學的前身（Adams 1998）。

談美國人類學的發展無可避免地必須提及 Franz Boas（1858-1942）。Boas 稱得上是個兼職的應用人類學者。事實上，1930 年代以前的應用人類學者大多和 Boas 一樣，都是「兼職的」。也就是說，他們主要是在學院教書、研究，但同時也接受政府或基金會等非學院機構的研究委託（Gwynne 2003:59）。Boas 的人類學生涯致力於推展以文化相對論為基礎的反種族論述。他不僅大力鼓吹印地安文化的保存工作，也運用人類學的理論反駁當時美國關於新移民的種族論述。Boas 可謂美國人類學界中最早呼籲學術應與政府保持距離者。1919 年 Boas 公開批評美國科學家從事間諜工作，並指出四名人類學者，以科學機構代表之名，在海外參與戰爭情報蒐集（Boas 1973[1919]:51–52）。當年美國人類學會內部派系分眾，欠缺共識，學會內部次群體批評 Boas 的言論，甚至剝奪其執行委員的資格，卻無公開調查 Boas 所言是否屬實，亦未公開辯論或界定何謂學者應有的合宜作為（劉紹華 [出版中]）。順帶一提，約於此時在英國，牛津大學於 1906 年創立了第一所人類學系，主要是為了訓練殖民地的行政官員（McDonald 2002:2）。由牛津大學人類學系的成立與 Boas 曾被美國人類學會申誡的事件來看，早期人類學界對於反省學術倫理與政治的界線明顯不成熟。

第三個階段「聯邦工作時期」是應用人類學的重要發展期。當時美國的經濟危機是重要的背景因素，1929 年美國股市崩潰引發了十年的大蕭條，社會上新興的貧窮與社會議題成為人類學的新的關注焦點（Gupta and Ferguson 1997:22）。羅斯福總統展開新政（New Deal）（1933-1938）以促進就業。包含人類學者在內的許多學者首度在學院外找到全職工作，進入政府機構與私人企業，其中政府部門的工作以美洲印地安事務為主。這亦與美國政府印地安工作的領導風格改變有關。在此之前，美國人類學者相當抵制參與政府的印地安事務。1932 年 John Collier 入主印地安事務局，他的風格迥異於之前的官員，對於印地安文化與傳統極感興趣，聘僱不少人類學者加入印地安事務局的工作，包括參與研議 1934 年的《印地安重整法案》（Indian Reorganization Act）（Gwynne 2003:59; McDonald 2002:3）。雖然後人曾批評 Collier 對於印地安人仍秉持傳統的家長式作風，但在當時那個保守年代，他的作為實則為主流社會中的一大突破。此外，人類學也不僅受雇於政府部門，同時也擔任企業顧問。著名的計畫如 Hawthorne Project（1931-1932），即為在芝加哥地區外圍的西方電子公司（Western Electric Plant）研究工作條件與勞工生產力之間的關係（McDonald 2002:3）。

人類學者與政府合作的趨勢在二戰期間臻於高峰。在日本襲擊美國珍珠港事件後，美國人類學會史無前例地正式認可其成員參與戰爭工作，許多成員加入戰爭情報蒐集以對抗「軸心國」。據統計，當時美國 303 名專業人類學者中，超過 295 名以兼職或全職的方式投入戰爭相關活動（Gwynne 2003:62; Mead 1977:149）。例如，Margaret Mead 參與了美國政府在戰爭中提升美國士氣的研究（Mead 1979）。另一個例子是 Ruth Benedict 為協助「同盟國」理解日本，參與了民族性研究，寫出關於日本社會與文化的經典之作《菊花與劍》（*Chrysanthemum and the Sword*）（Benedict 1946）。當時美國人類學界普遍認為，在二戰中參與政府工作是符合專業倫理的作為（Gwynne 2003:63）。不過，對於戰爭的反省，以及對於學者參與戰爭的作為，後來成為人類學倫理規範發展的重要面向（劉紹華 [出版中]）。

在此階段中另一個重要事件便是美國應用人類學會（Society for Applied Anthropology, SfAA）的成立。一群曾經參與社會甚至世界議題實務工作的青年人類學者，包含 Ruth Benedict 及 Margaret Mead，於 1941 年在哈佛大學創立此學會，強調應用研究對於社會問題及人類關係的重要性（Gwynne 2003:62）。該學會並於 1948 年正式提出《倫理規範》（Code of Ethics），可謂第一個人類學相關的專業倫理規範與詳盡宣言，並刊登於其機關刊物 *Human Organization*（Society for Applied Anthropology 1951）。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是美國應用人類學發展的黃金時期。當時社會百廢待舉，在「正義」、「理性」、「平等」等新國際價值的趨勢下，人類學也有所蛻變。不少曾經投入戰爭研究工作的學者留在政府或私人部門就職，但大部分的人還是回到學界任教。雖然在後來的美國國際政策與事務中，人類學者的角色並不明顯。不過，在社會議題上，人類學的影響力持續發展。更多學者以社會變遷的推動者自居，積極參與社會事務。許多應用人類學者對於客觀、價值中立的研究感到不以為然，而開始提出不同的研究觀點。其中一個帶有方法實驗性質的「福斯計畫」（Fox Project），是芝加哥大學教授 Sol Tax（n.d.）帶領學生在愛荷華州的 Mesquakie 印地安保留區研究 Fox 印地安人的社會組織，演變成與當地人合作的參與式發展計畫，開展了後來稱之為「行動人類學」（action anthropology）的領域。[1]

第四個階段是 1970 年代中期以後的「政策研究時期」，這是美國人類學倫理規範的重要界定時期（劉紹華 [出版中]）。此時，學院內人類學相關工作數量驟減，學者只能繼續在學院外求職。據稱，1972 年時，百分之十二的人類學博士從事非學院的工作；到了 1977 年時，這個比例已增加到三分之一（Price 2001）。於是在 1983 年，一群在學院外工作的專職人類學者成立了全國人類學實作學會（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the Practice of Anthropology），以推廣人類學的專業應用為主。值得一提的是，應用人類學會、美國人類學會、及全國人類學實作學會都曾自訂專業的倫理規範。筆者之一曾在另一篇文章中詳細比較與說明美國人類學會多次修訂其倫理規範的歷史（劉紹華 [出版中]）。其中，1990 年代當美國人類學會修訂其倫理規範時，與全國人類學實作學會便未能達成共識。具有主導性地位的美國人類學會，其倫理規範一向將「被研究者」視作人類學者最重要的倫理責任對象。雖然在全國人類學實作學會的強力要求下，美國人類學

1. 參考 Fox Project 的檔案 1932-1959, Ms 4802 -- Sol Tax – Fox field notes and Fox Project records. National Anthropological Archives, Smithsonian Institution.

會在 1990 年的倫理規範修訂中增加了「對於雇主與客戶的責任」此一原則，且沿用至今。不過，美國人類學會的倫理規範仍繼續保留「流通研究成果」的條文，這讓全國人類學實作學會感到為難，因為某些應用人類學者與雇主簽訂的契約不見得讓研究者都能自由流通研究成果，其中存在所有權的問題（Jordan 1996）。但美國人類學會對此並未妥協，而是建議所有的人類學者在簽訂契約時都要注意權利義務以不違反人類學倫理精神為原則。兩者間的分歧反映當人類學進入應用實作的領域時，必須面臨在權利義務關係上的倫理掙扎與協商。

社會現實促使應用人類學研究持續發展。新興社會議題不斷出現；學院內工作有限，學校仍持續培養人類學博士，大量的人類學者只能到學院外尋找工作，研究動機與目標也因而轉變。在諸多原因的推拉之下，1970 年代後應用人類學在美國蓬勃發展，開展出一些新興研究領域與方法，尤其以多元文化教育、衛生醫療、農村發展、環境生態、都市議題、視覺媒體等領域為要。這些新興領域充分彰顯出應用人類學跨學科的方法特性，以結合各種方法推動社會變遷、改善社會福祉為旨。

三、應用視覺人類學研究與倫理規範

儘管我們能夠簡單回顧應用人類學在美國的發展歷程，但至今關於應用人類學的定義卻仍莫衷一是，從不同的面向來看可能會有不同的指涉。一般而言，最簡單的分法是從學者的身分觀之，即學院外的人類學者所從事的人類學研究，即屬於應用人類學，以全國人類學實作學會為代表。然而，在學院內工作的人類學者也可能從事學院外的研究計畫，因此，亦可能從經費來源區分研究性質。就此而論，早期英美兩國的人類學者都稱得上是兼職的應用人類學者，不論是 Bronislaw Malinowski 或 Franz Boas 都接受過政府的委託計畫。如同今日學者接受政府的委託計畫，包括政策評估或撰寫地方志等。

但反過來說，在學院工作、執行學院計畫的人類學者的研究就不是應用人類學嗎？似乎不盡然。我們在眾多非以應用為名的學術刊物上，仍然可見不少研究具有明顯的實用政策意涵。或者，我們也會在以應用為名的期刊上看到許多透過個案討論理論本質的研究。換言之，研究目的與研究意義也可能是區辨應用人類學的面向之一。本文的第一作者目前擔任 *Human Organization* 的編輯委員，瞭解該刊對於甚麼樣的文章合適該刊的定義是：文章是否「得以應用」（applicable）。這是一個非常寬廣開放的定義。換言之，文章提供的問題意識、知識、方法、研

究發現或限制等，只要能對於人類社會的研究有所助益，便是應用人類學的範圍。這大概是我們理解的最「集大成」的定義。

從這些不同的定義面向，可看出應用人類學的跨界性質，不僅跨越學院高牆，也可能跨越學科分類。常見的應用人類學研究領域，其共同焦點是社會問題導向。也因此應用人類學與社會學或醫學等其他學科多所交集，尤其是針對環境、健康、貧窮、性別不平等等議題。人類學對於文化的關注與敏感是此類跨學科研究中的重要特色。

近年來在華人人類學圈發展熱絡的視覺人類學，不論從研究工具或涉入議題觀之，是相當跨界的人類學分支領域。不僅得以彰顯出人類學共有的倫理議題，也可能超越傳統人類學倫理討論的侷限。在視覺人類學的傳統中不乏應用案例，不過，這些例子尚未被納入應用人類學或應用視覺人類學的討論框架中加以整理，並探討其意義（Banks and Morphy 1997; Grimshaw 2001; Loizos 1993; van Willigen 1993）。當今科技發展使得視覺媒介的取用更為普及，不少運用影像介入社會問題的行動計畫應運而生。例如，疾病患者或家屬互助團體藉由錄像帶或 DVD，交流照護知識，並傳遞支持力量；災後心靈重建計畫透過影像的陪伴進行療癒或創傷轉化等，都是具體例子。其他諸如傳染性疾病的防治宣導，或者社群發展的議題，也常引入視覺計畫，以提供可能的解決之道或討論政策影響。

受到人類學界整體的倫理規範影響，近年來，視覺人類學也陸續開始討論倫理議題。例如，英國與大英國協社會人類學會（The Association of Social Anthropologists of United Kingdom and Commonwealth）在 1999 年《良好研究實作的倫理指南》（*Ethical Guidelines for Good Research Practice*）的版本中，便已初步提出對視覺媒體適當運用的建議。[2] 遠在南半球的澳洲人類學會（The Australian Anthropological Society）於 2003 年公布的《倫理規範》（*Code of Ethics*）幾乎一字不改地採用了英國與大英國協社會人類學會針對視覺媒體的使用規範。[3] 至於美國人類學會，雖然在其《倫理規範》中並沒有針對視覺媒體的使用提出特定規範，但其旗下的視覺人類學會（The Society for Visual Anthropology）自 2007 年至今已舉辦過五次的「視覺倫理圓桌論壇」（Visual Ethics Roundtable），推動視覺人類學倫理的討論。

2. 詳細指南請參考網址 http://www.theasa.org/ethics/Ethical_guidelines.pdf。
3. 詳細規範內容請見 http://www.aas.asn.au/docs/AAS_Code_of_Ethics.pdf。

無獨有偶，一向與視覺人類學研究交集互動密切的英美視覺社會學組織，也相繼制訂了倫理規範或守則。例如，英國社會學會（The British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轄下的視覺社會學團體（The Visual Sociology Group）發布的《倫理實作聲明》（*Statement of Ethical Practice*），[4] 以及國際視覺社會學會（The International Visual Sociology Association）幾年前修訂的《研究倫理規範與指南》（*Code of Research Ethics and Guidelines*）（Papademas and the International Visual Sociology Association 2009），都是相當明顯的例子。相較於社會學界明文訂定的視覺研究倫理考量，或者如同英國、澳洲人類學會針對特定視覺媒體的簡要規範，美國視覺人類學會則採用論壇型式，在新興數位媒體的生活世界中，以更為互動開放的態度，持續探索、發掘「視覺」所展現出的不同面向，及其多重倫理意涵。

美國視覺人類學會徵求個案時，特別強調發表人在呈現研究成果時不要讓自己的案例落入「這樣做」或「不要那樣做」的簡單二分邏輯，而是希望看到人類學者運用視覺媒介或資料時，如何思考、處理現實世界中各種協作關係所衍生出的倫理議題。這樣的案例得以突顯運用視覺媒體時可能涉入的複雜環節，包括在生產、製作、消費或流通等不同場域中，可能引發的各式倫理問題或道德責任。[5] 包括「誰擁有影像？」、「誰可以複製影像並用於教育場域？」、「〔視覺〕坐落何處？」、「如何操縱和解釋？」、「產生何種影響？」、以及「誰擁有管理技能以盡可能降低負面後果？」等問題。提出這些問題主要是用來檢視視覺影像生產與流通的整體能力訓練中，關於「究責」、「責任」、「社會正義」、「作者身分」、「嚴謹性」以及「明確性」等問題的實際考量（Perry and Marion 2010:100）。

這些問題對於視覺人類學者而言並不陌生。由於視覺人類學者在研究中會使用或合併影像媒體，很早便意識到帶著視聽器材進入田野或現場中，可能會令研究對象感到疑惑並提出詰問，甚至產生衝突，這些現象需要田野工作者當機立斷地予以回應。以視覺人類學領域中最為蓬勃發展的民族誌影片拍攝為例，我們可以看到導演如何在影片攝製當下，察覺、思索、反省拍攝計畫所牽涉的對象、主

4. 詳細聲明內容請參考網址 http://www.visualsociology.org.uk/BSA_VS_ethical_statement.pdf。
5. 2009 年圓桌會議就特別注意到影像做為一種物件有其生命史，經常從原先的意義生產之框架溢出，以一種意想不到的方式被取用或誤讀。因此，運用視覺媒體的人類學者有責任對人類學識框內所生產的知識，卻延伸出識框外的意義或指涉，保持警覺、預先防範，以擔負起影像知識生產與分配的一定道德責任（Perry and Marion 2010:97）。

題或述說位置的演變，並預測、評估影片新的走向在知識論、政治或倫理上的意義與可能效應。

民族誌影片的影像紀錄屬性，使得影片在實際拍攝過程中，產生的原始資料係有別於文字媒介的具象「材料」，是一種不好塗擦、「難以逆轉」的媒介格式。因此，當影片攝製過程中某個環節有了突發事件或其他因素介入時，到底影片應該按照計畫進行以完成合約規定，還是改弦易轍調整影片主題、主軸或調性？David MacDougall 在〈誰的故事？〉一文中，便指出了民族誌影片再現「他者」在本體論與道德面向上的深沉議題（MacDougall 1998:154）。

David MacDougall 與 Judith MacDougall 兩人於 1970 年代後期開始拍攝一系列澳洲原住民題材的影片。其中一部是關於北澳邊防地區，一小群原住民試圖重新整理部落土地、畜養牛隻，以期讓傳教時期留下來的荒廢祖先故土，轉型為有經濟產值的基地。影片原本的重心落在一位年邁的部落長者。但隨著影片的進行，又逐漸移轉到一位勤奮又有文化傳承使命感的 13 歲男孩身上。影片拍完後，兩位導演聽聞小男孩因病過世，David MacDougall 的反應是：「就在那一刻，我對蒐集到的影片故事、素材之理解與感受有了劇烈的變化。……我們聽到他的死訊時，這部影片也隨著他死去了！我們只能在一段時間之後應男孩雙親的希望回到那裡，完成對這位小男孩的回憶。」（MacDougall 1998:153）。

民族誌影片製作還有其他諸多倫理「難題」。例如，影片在脫離影像生成的社會文化脈絡後，經由發行與映演管道流通資訊、散布影像，影像的使用與傳遞能否顧及被拍攝對象的文化或規範也是問題。某些澳洲原住民族群或臺灣蘭嶼達悟族人傳統上對死去親人的影像有觀視的禁忌。影像工作者是否在影片製作的各個環節中，一併考慮被拍攝對象的文化禁忌與規範？諸如此類議題都涉及權力、倫理與專業責任的辯證思考。這些問題都是應用人類學的核心議題。

四、實際倫理討論案例

應用視覺人類學的情形的確相當複雜。如前所述，影像記錄不同於文字書寫。合併視覺影像的應用研究，必須先瞭解當地的視覺文化或特定影像的文化意義，以及研究對象或潛在觀眾對視覺「真實」這一概念的看法，以事先評估影像傳達的可能效應。尤甚者，目前視覺應用計畫捲入商業利益的情形明顯增加，因此攝取影像的當下便須告知研究者將如何詮釋影像、如何使用，並告知研究對象將來可以透過何種管道取得研究資料。換言之，研究資料所有權的問題變得相當複雜。向研究對象說明研究目的，以協商取得知情同意也變得更為重要。

以下提出三個實際案例，說明人類學者如何透過應用視覺計畫，以期達成改善研究對象的社會處境。三個案例涉及的情境與健康及不平等有關，促使我們在新興社會脈絡下思考權力、責任和倫理間的糾結關係。

（一）視覺應用與醫療介入

視覺人類學者 Richard Chalfen 的「影像敘事計畫」（The Visual Narratives Project），在醫療場域中錄製年輕慢性病患（諸如哮喘、肥胖患者）分享醫療診斷過程的經驗。病患透過對自己身心狀態的講述、觀察與反思，提出關於治療的看法、問題與需求。這些疾病影像敘事得以用來「教導」臨床醫師如何更敏銳審慎地看待年輕患者的「心聲」。這項計畫將影像介入與預防評估（Video Intervention/Prevention Assessment）運用於醫療場域。通過影像媒介，讓原本視覺（技術）與醫療檢查／眼光牢不可破的關係，轉換為就診病患透過影像檢視自己的身體狀態，以訴求醫療關係的改善（Chalfen and Rich 2009）。人類學者在此計畫中扮演的便是文化中介者的角色，藉由影像敘事為病患與醫療人員兩造間，搭起協商的橋樑，以提升醫療照護的品質。

此一雄心勃勃的計畫，在應用視覺媒介參與醫療的過程中，必須面臨倫理與道德情境上的高度複雜性，包括不同研究領域在理論、實踐與倫理思辨方面的不同源流、脈絡及意涵。以上述合作個案為例，研究者必須簽署「影像介入與預防評估哮喘研究試驗的協議」。這一協議必須經過倫理審查，諸如醫院的倫理委員會需對臨床調查研究進行同意，研究者亦應說明如何使用研究參與者的個人資料並予以保密等。生物醫學的倫理規範尺度與核准程序，與一般的人類學研究常有所差異。所以當應用視覺人類學的研究涉及跨學科的合作時，就必須先理解學科或領域之間的異同，以展開彼此間的倫理溝通與磨合。

（二）凝視愛滋病患之苦

愛滋病在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的問題嚴重，在大量文盲人口間展開防疫工作是項重大挑戰。「走向未來」（Steps for the Future）便是一個透過影音宣導愛滋病防治的實驗計畫。[6] 研究者讓當地人參與影片拍攝，並邀請國際知名導演協助

6. 「走向未來」的想法是由 YLE Finnish Broadcasting Company 的紀錄片委任編輯 Ikka Vehkalahti 和南非的影片製作者 Don Edkins 所發起。不僅是國際和南非洲影片製作的合作，亦是在非洲所進行的最大的紀錄片計畫。「走向未來」團隊也架設了網頁，讓非洲及其之外的知識份子可以互相連結（參考 Levine 2009）。

他們在剪接與敘事上的技術與方法。換言之，這些導演並非受邀來主導拍片，這是一個「老鷹帶小雞」的過程。這些外來專家的角色是協助當地參與者，並非去改變影片製作者的在地觀察與視野。

這個動機良善的案例可能涉及的倫理問題，類似於本文之初提及的印度個案爭議。紀錄片裡呈現的是愛滋病感染者的心路歷程與醫療抉擇，其用意在於激勵觀影者的「同理心」來思考個人和疾病的關係，進而改變對疾病的諸種意識，包括打破閱聽大眾基於污名、無知、無視等所造成對於愛滋病患者的沈默。Levine（2009）從「觀眾民族誌」（audience ethnography）的研究取徑，分析與評估賴索托、南非與莫三比克三地的觀眾對於這組影片的反應。她指出這種作法和常見的官方或主流媒體的手法有所不同，而是企圖透過貼近個人情感的方式，改善人們對疾病的認知和意識。換言之，這組紀錄片使用的雖然是相當個人私密的方法，但將心理過程在閱聽的公共領域中公開時，其目標無疑具公共性。在公眾場合看了影片後的觀眾（有可能是病患）在映後現場的回應或坦白（出櫃），其實承擔相當大的風險。尤其，當他們離開這個「友善」的閱聽現場後，還是得繼續面對巨大的社會壓力。

（三）社會倡議的影像計畫

應用人類學者由於經常面臨弱勢族群的困境，可能會從研究者搖身變為介入倡議者，這是相當個人性的倫理選擇。著名的視覺人類學者 John Marshall 是典型代表。Marshall 不只是一名經驗豐富的民族誌影片導演，同時也是一位運用影像進行社會介入的倡議者。他所攝製的影片透過「紀錄片教育資源」（Documentary Educational Resources, DER）這個組織廣為傳播。[7] 經過多年的千辛萬苦，1978 年 Marshall 終於得以重返他之前在非洲的研究地點奈奈地區（Nyae Nyae），當地芎瓦西人（Ju/Wa Bushmen）多年前從傳統生活領域被迫移往瓊貴（Tsumkwe）地區定居，Marshall 見證了新居地已成為當地人口中的「死亡之地」。芎瓦西人在瓊貴地區悲慘的生活情形促使 Marshall 跳脫出觀察紀錄者的角色，轉而積極投入改善芎瓦西人生活的行動。[8] 1981 年在 Marshall 的父親 Laurence Marshall 創立

7. 創立於 1968 年的 DER 是美國一個具有相當規模的非營利組織，發行及推廣視覺人類學、民族誌影片與紀錄片。此機構所發行、代理的影片在價格上比一般片商所訂定的價格便宜。

8. 《喀拉哈里家族》的第二部曲《道路盡頭》（*End of the Road*）（Marshall 2002b）一開頭就清楚交代了芎瓦西人自 50 年代末期至 80 年代期間的生活變化。二十年來的變遷讓當地人生活更加無望，因而觸使「重返故地」的 John Marshall 毅然決然跳脫純粹紀錄片工作者的身分。

的「芎瓦西人發展基金」的推動下，John Marshall 與芎瓦西人一起向政府、國際援助與發展計畫基金的組織成員協商、遊說與表達意見。倡議期間 John Marshall 不再攝製早期為人類學教學而製作的民族誌影片（如 *The Hunters*）（Marshall 1957），反而剪輯一些影帶資料，用來展現芎瓦西人的觀點，聲張他們的權益，充分實現應用人類學或實踐人類學（practicing anthropology）的倡議行動。2002 年完成的《喀拉哈里家族》（*A Kalahari Family*）五部曲（Marshall 2002a），再度呈現出深具時空縱深與行動意涵的珍貴影像材料，是為倡議影片（advocacy cinema）的真實體現。

透過《喀拉哈里家族》五部曲等系列影片，John Marshall 的倡議方式廣為流傳，更奠定其在人類學界的重要地位。《喀拉哈里家族》五部曲總長六小時的影片內容壓成五片套裝 DVD，由 DER 發行，提供全球不同機構、學校與各界人士選購使用，盡可能地讓影片廣為流通，以期大眾認識芎瓦西人真切面貌，而不只是停留在《上帝也瘋狂》（*The Gods Must Be Crazy*）（Uys 1980）中的刻板印象。

不過，由於人們常自認為是包容他者的自由主義者，事實上卻常表現出對異文化的誤解或排斥。[9] 因而立意良善的影片仍難免可能被預想不到的目的所誤用，或是影片的內容被觀眾曲解。此外，即使應用視覺人類學的計畫初衷與利益無關，然而，當某項學術計畫變成電影製作或與商業活動連結時，此時視覺人類學者的學術研究便可能變成有利可圖的計畫。如此因應而起的便不只是學術道德與研究倫理的問題了。更甚者，當影像資料被複製、數位化或收入任何形式的資料庫，不管是基於學術目的或商業用途，研究者都將面對一連串與研究對象有關的新興倫理問題。

五、結論

本文回顧應用人類學發展過程中出現的倫理爭議，並以視覺人類學為例，進一步說明當代應用人類學者在關注或介入社會現象時，可能面臨的跨領域與多元方法的複雜倫理挑戰。人類學者，尤其是處理攸關人命福祉議題的應用人類學者，在研究中可能遭逢的倫理挑戰，經常不是非黑即白的明確規範得以提供解決之道。這也是何以近日美國人類學會的倫理規範，從較為細緻的條文式規範，修

9. Martinez（1992）對於民族誌影片用於大學講堂，引導學生認識異文化並傳遞文化間理解的效能，有諸多討論。Martinez 在課程的進行中觀察到，即使在觀影前為選課同學做了一些講解與準備的工作，但還是常常發現有學生於觀影心得報告中，表露對「原始」文化、落後「他者」的刻板印象。

訂為僅含七大原則。包括：不傷害、公開與誠實、取得知情同意與必要許可、平衡對於不同關係人的倫理義務、公開研究成果、保護與保存研究資料、以及維繫符合倫理的專業關係。[10] 新版修訂建議強調倫理是一動態的思考過程與實踐（American Anthropological Association 2011）。美國人類學會長年以來持續修訂其倫理規範，充分說明了研究者在社會變遷中持續思索與調整倫理作為的必要性（劉紹華 [出版中]）。

美國應用人類學所經歷過的倫理挑戰與論辯，對於華人地區發展應用人類學有何意義？本文以此大哉問作為結論，意不在提出答案，而是試圖點出不同華人地區可能面臨的倫理情境異同。人類學作為一門當代學科，自然有其超越地域的共享倫理規範與思考，但不同的華人社群（例如中國大陸、香港、臺灣等），其社會發展與政治經濟處境大相逕庭，學術發展與實作的歷史與社會脈絡也差異頗殊。在這些明顯的差異之上，要提倡共通性的華人應用人類學倫理自然有其困難之處。此刻我們只能提出一些問題以為未來討論思辯之用。

應用人類學在研究倫理上所表現出的一體兩面特性，說明了此領域具備的多重社會意義，在不同的政治與社會情境之下，其發展方向可能有所不同。例如，以美國為例，人類學的發展及其相關的倫理討論中，檢討學術與「國家／政府」及「研究對象」之間的權力與合作關係，是不可或缺的面向（劉紹華 [出版中]）。但在其他地區，人類學的肇始可能便是以政府發展計畫為要，例如加拿大的原住民研究、中國的少數民族研究，臺灣日治時期的高砂族研究等。雖然應用人類學有龐大的社會需求，但其在特定地區所表現出的學術重要性則可能受到不同的歷史、政治、與社會情況的影響，因而現實上的倫理關注焦點亦可能有所差異。

總結應用人類學的特質與倫理考量，有幾點是美國脈絡下的重要議題：與研究對象的關係（主要包括原住民等弱勢族群）、與國家／政府的關係、以及與非學院之經費贊助者的關係。華人地區的人類學發展中同樣也涉及這些議題，只是情況可能有所不同。筆者對於香港的情形瞭解非常有限，在此只能略談臺灣與中國大陸的情形。

過去五十多年來，臺灣人類學發展中也曾面臨諸多與原住民族相關的倫理議題。當臺灣的族群政治在民主化後更為細緻發展時，這些議題也變得更為複雜（劉紹華 [出版中]）。然而，因歷史時空之故，應用人類學近年來在臺灣的發展相當有限，遑論人類學為關注研究對象而進行介入或倡議工作。此外，雖然臺

10.參考 http://www.aaanet.org/cmtes/ethics/Proposed-Revised-Code-of-Ethics-for-Public-Review.cfm

灣人類學者實際上仍偶爾從事應用研究，例如接受政府或民間機構的委託計畫，卻似乎並未意識到或公開討論其間可能碰觸的倫理議題。

至於中國的情形可能更為複雜。學者明顯涉入國家少數民族政策的制定，亦常仰賴國際組織或非政府組織的經費從事各類研究，研究過程中經常密切地與政府機構或官員合作，學界中常議論的剽竊、扭曲研究成果、以及濫用學生資源等問題，突顯出從微觀到巨觀的倫理面向，都是中國在發展應用人類學時應注意並公開討論的議題。

在不同地區的學術發展過程中，我們可從研究主題、經費來源、研究目的等面向，來檢視在地人類學者對於研究中不同關係的界定與倫理立場。以研究經費來源與目的而論，國家與政府的角色在亞洲的情形可能更為明顯，但華人世界如何看待學術與政府的界線？人類學者經常位處於政府與弱勢的研究對象之間，其對於權利義務責任的優先對象應為何者？存在於研究情境中的關係確實難解，但對於權力的敏感應是人類學者的必要倫理基礎。

美國人類學的倫理爭議歷史可引以為鑑。「報導人」在人類學研究方法中的角色舉足輕重。眾多人類學文獻討論研究者與報導人所代表的研究對象之間的權力位階與倫理關係，直指人類學研究的核心議題。日常生活中倫理的複雜性並非黑白分明，標準可能隨著情境而改變。在某個情境下的職業倫理，換了個權力關係脈絡，可能就出現問題。換言之，沒有一種標準化、技術性的倫理準則適用所有情境。人類學可能提出的唯一根本共識是「不傷害研究對象」。此一專業基準在應用人類學的特質中，既是目標也是潛在挑戰。但至於如何避免傷害，還需要研究者在諸多的協作關係中辨識與釐清不同且糾結的權力關係。這是以經驗現實為要的應用人類學者難以迴避的倫理挑戰與義務。

參考書目

劉紹華

[出版中] 倫理規範的發展與公共性反思：以美國及臺灣人類學為例。文化研究。

Adams, William Y.

1998 The Philosophical Roots of Anthropology. Stanford: CSLI.

American Anthropological Association

2011 Proposed Revised Code of Ethics for Public Review. Arlington: American Anthropological Association.

Banks, Marcus, and Howard Morphy, eds.
1997 Rethinking Visual Anthropology.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Benedict, Ruth
1946 The Chrysanthemum and the Sword: Patterns of Japanese Culture.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Boas, Franz
1973[1919] Correspondence: Scientists as Spies. *In* To See Ourselves: Anthropology and Modern Social Issues. Thomas Weaver, ed. Pp. 51–52. Glenview: Scott, Foresman.

Chalfen, Richard, and Michael Rich
2009 Combining the Applied, the Visual and the Medical: Paitents Teaching Physicians with Visual Narratives. *In* Visual Interventions: Applied Visual Anthropology. Sarah Pink, ed. Pp. 53–70. New York: Berghahn.

Fluehr-Lobban, Carolyn
2003 Ethics and Anthropology 1890-2000: A Review of Issues and Principles. *In* Ethics and the Profession of Anthropology: Dialogue for Ethically Conscious Practice. 2nd edition. Carolyn Fluehr-Lobban, ed. Pp. 1–28. Walnut Creek: AltaMira Press.

Grimshaw, Anna
2001 The Ethnographer's Eye: Ways of Seeing in Modern Anthoropolog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Gupta, Akhil, and James Ferguson, eds.
1997 Anthropological Locations: Boundaries and Grounds of a Field Scienc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Gwynne, Margaret A.
2003 Applied Anthropology: A Career-Oriented Approach. Boston: Allyn and Bacon.

Hastrup, Kristen, and Peter Elsass
1990 Anthropological Advocacy: A Contradiction in Terms? Current Anthropology 31(3):301–311.

Jhala, Jayasinhji
2009 Emergency Agents: A Birthing of Incipient Applied Visual Anthropology in the 'Media Invisible' Villages of Western India. *In* Visual Interventions: Applied Visual Anthropology. Sarah Pink, ed. Pp. 177–190. New York: Berghahn.

Jordan, Ann
1996 Review of the AAA Code of Ethics. Anthropology Newsletter 37(4):17–18.

Levine, Susan
2009 Steps for the Future: HIV/AIDS, Media Activism and Applied Visual Anthropology in Southern Africa. *In* Visual Interventions: Applied Visual Anthropology. Sarah Pink, ed. Pp. 71–89. New York: Berghahn.

Liu, Shao-hua
2010 Anthropological Ethics in the Shadows: Researching Drug Use and AIDS Interventions in Southwest China. Asian Anthropology 9:77–94.

Loizos, Peter
1993 Innovation in Ethnographic Film: From Innocence to Self-Consciousness 1955-1985.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MacDougall, David
1998 Transcultural Cinema.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Marshall, John
1957 The Hunters. 72 min. Documentary Educational Resources. Watertown.
2002a A Kalahari Family. 360 min. Documentary Educational Resources. Watertown.
2002b A Kalahari Family, Part Two: End of the Road. 60 min. Documentary Educational Resources. Watertown.

Martinez, Wilton
1992 Who Constructs Anthropological Knowledge? Toward a Theory of Ethnographic Film Spectatorship. *In* Film as Ethnography. Peter Ian Crawford and David Turton, eds. Pp. 131–161.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McDonald, James H.
2002 The Applied Anthropology Reader. Boston: Allyn and Bacon.

Mead, Margaret

1977 Applied Anthropology: The State of the Art. *In* Perspectives on Anthropology 1976. Anthony F. C. Wallace et al., eds. Pp. 142–161. Washington: American Anthropological Association.

1979 Anthropological Contributions to National Policies during and Immediately after World War II. *In* The Uses of Anthropology. Walter Rochs Goldschmidt, ed. Pp. 145–158. Washington: American Anthropological Association.

Papademas, Diana, and the International Visual Sociology Association

2009 IVSA Code of Research Ethics and Guidelines. Visual Studies 24(3):250–257.

Perry, Sara, and Jonathan S. Marrion

2010 State of the Ethics in Visual Anthropology. Visual Anthropology Review 26(2):96–104.

Price, Laurie J.

2001 The Mismatch between Anthropology Graduate Training and the Work Lives of Graduates. Practicing Anthropology 23(1):55–57.

Society for Applied Anthropology

1951 Code of Ethics of the Society for Applied Anthropology. Human Organization 10(2):32.

Singer, Merrill

1994 Community-Centered Praxis: Toward an Alternavtive Non-Dominantive Applied Anthropology. Human Organization 53(4):336–344.

Tax, Sol

n.d. Fox field notes and Fox Project records, 1932-1959, bulk 1932-1934 and 1948-1959. Manuscript 4802, National Anthropological Archives, Smithsonian Institution.

Uys, Jamie

1980 The Gods Must Be Crazy. 109 min. Ster-Kinekor Pictures. Botswana.

van Willigen, John

1993 Applied Anthropology: An Introduction. Westport: Bergin & Garvey.

Chinese Journal of Applied Anthropology, 1(1), June 2012, 117-135

The Ethical Challenges for Applied Anthropology: Learning from the US Case

Liu, Shao-hua

Associate Research Fellow, Institute of Ethnology, Academia Sinica, Taipei, Taiwan

Lin, Wen-ling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National Chiao Tung University, Hsinchu, Taiwan

Abstract

With an overview of the development of applied anthropology in the United States in terms of research topics, funding sources, and research goals, this article points out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is sub-field of anthropology as being simultaneously the most critical for the establishment of general anthropological ethics and the most subjective target of external scrutiny. Applied visual anthropology further provides concrete examples to illustrate the type of potential ethical challenges that may confront applied anthropologists who employ interdisciplinary methods in their research or intervention. The historical and politico-economic background of anthropologies in various Chinese communities has been different. The US case may exemplify an ethical imagery containing both the contorted historical processes and major controversies for us to understand the potential Chinese applied anthropology community in the making.

Keywords: anthropological ethics, applied visual anthropology, intervention, ethical controversy